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郭沫若



一、聪慧的幼年

峨眉山位于四川成都的西南部，七十二峰连绵叠翠，势如苍龙。就在二峨山的美女峰下，有一个沙湾场小镇。

镇子不算大，清末时只有 200 多户人家。一条南北直街，长约两华里。西倚二峨山，东临大渡河，依山面水。木结构的砖瓦街房鳞次栉比，店铺两两相对，不足两丈宽的街道，铺的是青石板。各家店面门前都留着廊沿，夏季还搭上五颜六色的遮檐凉篷，方便顾客。加上酒招、店幌，把整个街面妆点得色彩斑斓，呈现出南方小镇的特色。每逢二、四、七赶场日，四乡八镇的小商小贩和农民们，肩挑背负着自己的货物和农产品，络绎不绝地来赶场，在街道两旁设摊搭棚。于是，整个街道，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小商小贩的叫卖声，江湖医生沙哑的吆喝声，街头艺人卖艺声、小饭摊子上的锅碗瓢勺声，喊声，笑声，骂声，锣声，鼓声，汇成了一支交响曲。

就在这条街下场靠山的一面，有一家卖烟、酒、茶、糖、油、盐、酱、醋兼卖鸦片的三开间店面，柜台旁的立柱上，挂着一面苏体金字招牌，写着“郭鸣兴达号”五个大字。

郭鸣兴达号的老主人郭明德，人称秀山公，他和他的一个兄弟，是当地清水袍哥组织的舵把子，执掌过沙湾码头，拜在他门下的弟子就有几百人，在铜河（大渡河）、雅河（青衣江）、府河（岷江）的三河地区很有名声。秀山公左脸太阳穴上有一个三角形的黄色痣疤，所以人又送了他一个绰号，叫他“金脸大王”。又因他为人刚强、耿直，行侠仗义，济困扶危，一诺千金，因此人又称他“金钢佛”。

秀山公的疏财仗义，使父亲留给他的一份家业日渐凋零。他无力供给三个儿子全部读书，只供大儿子上学中了秀才，老二、老三读了几年私塾后便送去学徒，学经商，以便日后管好家里的店铺、糟房和盐井。

秀山公晚年，感到需要一个帮手。他见老三郭朝沛聪明机警，很有经济头脑，虽然只读了 6 年私塾，珠算却非常熟练，买卖上的事他也非常内行。秀山公决心将他从外婆家的盐井上叫回来，协助他管理沙湾的店铺。这年郭朝沛才 13 岁。这就是郭沫若的父亲。

郭朝沛协助父亲管理店铺，很快就显出了他的才能。他敢于只身跑铜河，跑府河，跑雅河，贩运粮食，兑换银钱，买卖鸦片，经营酿酒、榨油，屡屡赚钱。秀山公见儿子能干，不久就将家业管理全部交给了他。他便成了郭家的少年当家人。在他当家后不几年间，就把已经凋零的家业又恢复了起来，买田地，买盐井，买房廊，居然成了沙湾场的首富。

1872 年郭朝沛 17 岁时，父亲替他完婚，娶的是嘉定杜家场的一个零落的官宦人家的姑娘，叫杜荪福，这即是郭沫若的母亲。那年她过门时才 15 岁。

杜荪福出生时家庭已经衰败了。她在艰苦中长大，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她心灵手巧，虽然没有上过学，但在她的家庭环境中，耳濡目染，也识得不少字，还能背出很多唐诗。她学纺织，学绣花，学缝纫，一学就会，无师自通，很快就博得了“针神”的名声。

1892 年 11 月 15 日杜荪福又临盆了，这是她生的第八胎。生下的是男孩，这就是郭沫若。因为郭沫若母亲怀胎期间曾梦见一只花豹扑来咬住她的左手

虎口，所以家塾老师沈焕章给郭沫若起乳名叫作“文豹”，他的母亲虽然也喜欢这个名字，但却忘不了她生下的是第八胎，为了默默地纪念文豹前面夭折了的三个兄长，母亲就叫他“八儿”。因此，天长日久，文豹的名字倒被人们淡忘了，“八儿”的名字却成了他童年时代的通称。待到他再长大一些，乡人们都称他为“八老师”了。而郭沫若的名字则是他到1919年才用的笔名。郭沫若童年还有一个戏称，叫“郭大头”。因为他长得额角宽广，头大，耳大。

八儿长到三四岁时，不仅能背很多唐诗，还能听懂街上讲“圣谕”的先生说善书。善书的内容大多是民间的传说故事，劝人做好事不做恶事。大体是七个字一句，隔行押韵，所以又叫它“七字断”。说书人总是又说又唱，有时还用金钹、鱼鼓、简板之类乐器以助声势。周围站着听的人，随着宣讲人的情绪，有时欢笑，有时流泪。他们一听就是两三个小时。

八儿每逢这种时候，总要挤到台子前面，仰着脖子听，听完回来以后，还要给太祖母和妈妈学说一番，总引得大家发笑。

郭家从郭沫若祖父起，就非常重视子女的文化教育。秀山公临终前曾留下遗言：“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为此，秀山公在家里专门办起了一个家塾——绥山书馆，请了一个饱学先生沈焕章。郭沫若的大伯父、大哥开文和三伯父家的二哥，都是在这位先生教育之下考中了秀才的。

家塾就在郭家后院左侧的园子里，坐东朝西，一列三间，面对着二峨山。家塾的学生都是曾祖父以下家内几房的子弟，从四五岁到二十多岁的都有，共有10多人。

沫若的五哥开佐比沫若大5岁，早就进了家塾。沫若4岁时，五哥已经读《易经》、《书经》那类的古书了。那些听起来就像符咒一样的古文，叫一个八九岁的儿童去背诵，实在非常难。晚上，父母常督促八九岁的五哥在灯下念书、背书。那些文字从五哥口里念出来，成了一种像蚊子嗡嗡叫，让人打磕睡的声音，加上当时那盏只有两三根灯草的豆油灯，枣核大的一点火苗，更令人昏昏欲睡。沫若的五哥总是念不熟，父亲让他背也结结巴巴。沫若一边在旁边玩耍，一边无心听，不多久，他倒帮助五哥背诵出来了。父母都感到很奇怪，觉得八儿很聪明。

沫若的父母都觉得让八儿早点开蒙有好处，就决定过完年后送八儿进家塾。

1897年春节过后，沈先生来了，家塾开学了。父亲领着八儿来到家塾，先在“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前磕了头，然后又向沈先生拜了三拜。沈先生给他起了个“开贞”的学名，从此“郭开贞”这个女性化的名字一直用了20多年。

二、翩翩少年郎

郭沫若4岁半进入家塾读书，开蒙是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私塾里是没有上下课时间的，从早晨起一直坐到中午才放学，中午吃过饭后马上又得去，一直坐到天黑。郭家的家塾比起其他私塾又多加一会，就是晚饭后还要多加两个小时的夜课。

幼年时那种浪漫成性的生活，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郭沫若实在受不了。上课不到3天，他就逃起学来，赖在家里不愿去。既然穿了牛鼻子，

要脱是脱不了的。母亲劝，不行，最后还是父亲采用强制手段，把他夹在胳肢窝里送进了家塾。

一进家塾，不知为什么，那种在父母面前的威风就没有了。他不声不响地又坐到了自己的坐位上，头也不敢抬。这时就听见前后左右的同学们指指点点地小声说：“逃学狗，逃学狗。”沫若一下子感到无地自容，低着头，不敢正眼看同学。从此以后他不敢再逃学了。

沈先生的规矩是很严厉的，稍有差错，就要遭到体罚。他相信：“不打不成人，打到做官人。”

沈先生打人的刑具，是一种两分厚，七八分宽，一尺来长的竹板。正式的打法是打掌心、打屁股。非正式打法，就是隔着衣服、隔着帽子乱打。有时沈先生还将帽子拿下来打。学生们叫做“笋子炒肉”。先生看到有人稍有异动，就警告说：“哼！牛皮子又在发痒了！”

郭沫若的学习成绩很好，先生教的书都能背得出，字也写得好，常常得到先生的夸奖。沫若常听到先生对他父母说：“开贞大有长进。”但是郭沫若也经常被先生打。被打的原因，十回有九回是因为“不安分”，调皮捣蛋。例如有一次他在作业本上画上刚出土的几棵竹笋，旁边无心地写了一句：“笋子炒肉真好吃。”被先生发现了，于是就给了他一顿“笋子炒肉”，头上打起了几个包。

7岁那年，因上厕所贪玩，他被先生打了一头包，晚上睡觉时，头都不能着枕。母亲很心疼，便在家里找了一顶硬壳的瓜皮帽，里面衬上了毛毡，这样戴在头上可以起到保护作用。沫若仗着这顶“铁盔”又肆无忌惮起来。一天又招来先生一顿“笋子炒肉”。只听竹条打在头上“嘭，嘭”响，沫若假装“啊唷，啊唷！”喊疼，却不见他流泪。这被他五哥开佐看在眼里。等沈先生去厕所的时候，他就走过去摘下沫若头上的瓜皮帽，“噢！我说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他便跟沫若说：“八弟，这顶帽子借给我戴几天。”

沫若不肯，开佐就抢，你争我夺起来。正好沈先生回来，一追问，原来是这么回事，就把帽子没收了，又在他俩的头上打了不少包。

沈先生教沫若作对子，这是作诗的基础。它要求平仄对应，词性对应，符合格律。要背一段歌诀：“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三尺剑，五钩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这引起了沫若的兴趣。

有一天沈先生给沫若出了一个对子的上联：“钓鱼”。沫若立即写出了“打虎”。沈先生看了非常高兴。在吃晚饭时，沈先生对沫若父亲说：“开贞今天刚学作对子，就出口不凡。我出的‘钓鱼’，他却对出了‘打虎’。将来必成大器！”沫若虽然不懂“大器”怎样解释，心想一定是好话。

在学作对子的过程中，沈先生还给他们讲《声律启蒙撮要》，让他们读《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以后又读《诗经》、《楚辞》，还要他们读《唐诗正文》、《诗品》等书。慢慢地沫若也就入了门。沫若最喜欢唐诗，尤其喜欢王维、孟浩然、李白、柳宗元的诗，也喜欢屈原、陶渊明的诗，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讨厌韩愈。从10岁起，沫若就开始作诗了。

有一次，先生以他们常去钓鱼、游泳的“茶溪”为题，要沫若写一首绝句。沫若便很快写成交给沈先生。这首诗是：

闲钓茶溪水，临风诵我诗。
钓竿含了去，不识是何鱼？

一种颖悟的感触，飘逸的情致，自然流泻的笔锋，显露了少年诗人的才华。沈先生连声称好，并用朱笔在这几句旁加了连圈。沫若跟沈先生学了三四年的诗，打下了作诗的基础，也培植了他的诗人倾向。

在家塾的几年中，沫若不仅读完了“四书”、“五经”，还读了一些“子书”和“史书”，以及音韵、训诂之书。10岁左右沈先生给他开讲《春秋》，一面又叫他读《东莱传议》，两相印证，这使沫若受到很大启发。他那好发议论、好做翻案文章的性格，就从这儿开始养成。他后来喜爱历史研究，也是从这里打下了基础。

大哥进了洋学堂，这给沙湾带来了许多新风气。沈先生不再用竹板打人了。课堂的木板壁上挂起了一幅《东亚与地球全图》，把世界各国的位置都标出来了，沫若心中有了一个世界。沈先生本人也学起了笔算，不久也教他们笔算了。过去不让女孩子读书，现在沫若的妹子和侄女也都进了家塾。家塾里的空气活跃起来了。沙湾场还办起了一所洋学堂。家塾里孩子上洋操，沈先生就带他们去洋学堂。

第一次上洋操，沫若觉得很有趣。

教洋操的刘先生一开始面对家塾十几个孩子的队伍大声喊了一句：“奇奥次克！”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先生说的是什么意思。刘先生见大家听不懂，就解释道：“这是日本话，意思是‘立正’。”大家这才明白。于是，他们就被“奇奥次克”了好多次。先生又教他们练习向右转，向左转。向右转叫“米拟母克米拟”，向左转叫“西他里母克西他里”。于是，这帮孩子又被“米拟母克米拟”、“西他里母克西他里”起来。沫若只想笑，却又不肯笑出声。

刘先生又教他们齐走步，随着他们的脚步喊：“西，呼，米！”“西，呼，米！”沫若禁不住“咻”一声笑起来。刘先生生起气来，便罚他“奇奥次克”十分钟。原来“西，呼，米”是“一二三”的意思。当时办洋学堂的人，连这样简单的口令都没有翻译成中文，可见当时的教育水平了。

有一回，母亲给了他一次终生难忘的教育。

那是在沫若六岁的时候，他和五哥开佐中午放学回家，见妈妈不在厨房，便连忙跑到母亲房间。见母亲在床上躺着，额头上扎着一条宽宽的黑布带。他们问：“娘，你怎么啦？”

母亲告诉他们：“我头晕，老毛病又犯了，不要紧，休息休息就会好的。你们去吃饭吧。好好读书，听先生的话。”

他们听太婆说过，娘由于小时候生活苦，营养不好，过门后，家务事很劳累，又有这么多孩子，得不到好好休息，落下了头晕病。他们见过娘每回犯头晕病，都非常痛苦，躺在床上终日呻吟，不能吃饭，喝点水也要呕吐，要过好多天才能恢复过来。听娘说过，只有芭蕉花能治这种病。但要刚开几天、还是雌蕊的芭蕉花才能用。

五哥开佐突然想起在天后宫里有朵正开着的芭蕉花。他对沫若说：“八弟，跟我来！”

沫若问：“五哥，干啥子？”

开佐说：“别问，到那儿就知道了。”拉着沫若就跑，饭也顾不上吃。

他们一直跑到天后宫的围墙外，五哥从后腰抱起沫若：“八弟，看到没有？那里有一朵芭蕉花！”

沫若从围墙的窗户处果然看到院子里有一丛芭蕉，有一棵中间开着一朵

大黄花。

哥儿俩高兴极了。天后宫里没有人，他们便直奔那株芭蕉花。两人揪住花柄，好不容易才将花折断了。他们高高兴兴地把花拿回了家，一直跑进母亲房间。

沫若举着花对母亲说：“娘，你看，芭蕉花！”

母亲先是一喜，接着便问：“你们从那里买来的？”

他们告诉娘，说是从天后宫摘来的。

母亲听了后，陡然脸上阴沉下来，勃然大怒，指着他们：“两个畜生，还不给我跪下！”

哥俩吓了一大跳，不知犯了什么错。他们从没见娘发过这样的脾气，只好双双跪在娘的床前。

娘一面喘着气，一面指着他们说：“好啊，娘生下了你们这样不争气的畜生，娘倒不如病死的好了！”说着，便流下泪来。

开始，哥俩还摸不着头脑。只听母亲又断断续续地说：“别人家的东西，不得到大人允许是不能要的，……你们竟然去偷！娘不如死了的好！”说罢又哭了起来。

这时，沫若和五哥也都哭了，他们没有想到，从天后宫摘了一朵芭蕉花，竟犯了这么大罪。

他们的父亲听到了哭声，立即走进房来。当他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后，也大发脾气。把他们小弟兄俩揪到祖宗大堂上，叫他们跪在祖宗的神位面前，用竹板打一下训斥一句。兄弟俩的小手都被打肿了。打完了，父亲命令他们将芭蕉花立刻送回天后宫。

他们拿着花，哭哭啼啼走到天后宫，把它放在天后娘娘的神座前的香几上。那天的中午饭，父亲也没有让他们吃。

这件事给沫若兄弟俩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们从此渐渐懂得了一些做人的道理。

三、乐山夺魁起风潮

1905年10月，嘉定府的乐山高等小学开始招生，只招90名。1906年春天正式开学。

这消息传到了沙湾。人们都把它当成了一件大事。一般乡下人的看法是，县考是考秀才的。前几年虽然停止了科举考试，现在县立高等小学招考，就等于考秀才。

沙湾就有十几户的子弟准备去报考，各家父兄都准备亲自送他们的子弟进城。

沫若也报了名。他父亲放下了店中的事，亲自送沫若进城。那年沫若刚13岁。

考试的前两天，各家就相约包了3条船。那天一清早，他们就浩浩荡荡地动身了。

到了嘉定，他们先找了一个客栈住了下来，第二天休息了一天，第三天便参加了考试。

考试的地方就是前几年乐山县考秀才的考棚。那天差不多全县有两千人应考，不少考生看上去已经有三四十岁了。学校只招90名，因此大家都很紧

张。沫若的父亲也替沫若捏着一把汗。

考生一个挨着一个进了考棚，又按着自己的编号找到了自己的座位。前后左右有不少监考人，面孔都很严肃。

考卷发下来了。沫若拿到手一看，是一道国文题和几道数学题。题目不难，他心里有了底，就不慌不忙地做起来。他先做完数学，后写作文，一口气就将作文做好了。他向前后左右一看，还没有人交卷。于是又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毛病，他就第一个交了卷。

沫若走出考棚，走到考场为他们预备的点心桌前，尽情地饱吃了几块点心。然后，坐在草场上休息，等到大家全部交完卷，考场门打开了，他才走出考场。

头场考试在第二天就揭晓了，公布出来的大红榜上，沫若的名字被排在第 27 位。和他同来的沙湾十几名考生中，他考了第一，而且年龄最小。

他父亲非常高兴，鼓励沫若不要掉以轻心，要把复试考好。

第三天复试了，沫若又早早地交了卷。

复试结果，在公布的 90 名被录取生中，沫若被排在第 11 名。

沫若的父亲平常是不大有笑脸的。这几天，他的脸上经常挂着笑。别人夸奖沫若，他总是一面谦虚，一面得意。他还带着沫若走了嘉定的好几家亲戚朋友。

沫若的大舅说：“我们杜家一门风水传给五姨娘了！”五姨娘就是沫若的娘。

沫若的张二姨爹说：“八老表和大老表一样，年少成名，可喜可贺！”因为沫若的大哥也是 13 岁考中的秀才。

沫若父亲总是说：“哪里，哪里！客气，客气！”内心却是十分高兴。

1906 年过完春节后，沫若便进入了乐山高等小学。

高小的课程非常贫乏，新知识不多，不少课程还不如家塾里沈先生教的。除了帅平场先生的讲经引起他的兴趣外，其他课程知识都很浅。因此，课余时间沫若都在操场上玩耍、打兔子洞，做沙塔，捏泥人，翻跟斗，不到晚上他是不进自习室的。

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临近了，沫若没有把它放在心上，还是一天到晚玩耍。等到考试公布成绩时，沫若竟然考了第一名。

这下引起了极大的风潮。特别是那些年龄大的学生们，吵吵嚷嚷闹翻了天。

“郭开贞平时不用功，为什么有那样的成绩？”

“老师包庇郭开贞！”

“学校不公平！”

还有说得更难听的：“因为郭开贞有个小白脸嘛！”“我们也去买根红头绳把头发缠起来吧！”

他们撕了成绩榜，还推举了代表，去找学校领导，要求查卷子。

教务长帅先生给他们查了卷子，找不出不公平的证据。可是，他们还缠着帅先生改榜。帅先生被他们逼得没办法，终于找了一个理由，说郭开贞端午节请了 3 天假，扣了几分，把他降到了第三名。

沫若非常生气，认为帅先生欺软怕硬，向恶势力低头，他决心找机会报复，出这口恶气。

机会来了，上学期带头向学校抗议，要求改榜的那位徐老童生，因为家

里有事，开学时回校迟了几天。这时，吃饭的饭桌已经编排好了，老师便把他编到沫若一帮小同学最末一桌来。

这位徐老童生饭量既大，吃菜又不让人，吃了这边，筷子还要夹到那边。小同学们对他讨厌极了。一天中午，沫若和小同学们约定，大家每次盛饭不要装满，吃得快一点，让饭瓢不要落到老童生手里，同时吃菜也不要让他占便宜。

大家就这样秘密执行起来，那顿饭可苦了那位老童生。一桶饭一会儿就被沫若他们几个小同学抢光了，菜盆子也吃得底朝天。老童生吃了第一碗，第二碗始终没有吃上。他气呼呼地跑到校长室报告校长易老虎。易老虎把沫若等7个小同学叫到伙食管理处，严厉地责问他们：

“你们为什么不把饭给他吃？”

“哪个不把饭给他吃哩！饭桶是放在桌子上的。”一位小同学回答。

徐老童生说：“你们把饭瓢占着不给我。”声音里带着哭声。室外旁听的学生们哄笑起来。

易老虎向围观同学发起虎威来了，“笑什么！你们这些东西！”他又环视着7个小同学：“你们为什么不把饭瓢给他？”

另一个小同学说：“饭瓢少，8个人只有一只。但是他也太不聪明啦，饭瓢轮不到他，他为什么不用自己的碗挖呢？”

室外又发出了一阵哈哈笑声。

“你们这些小东西！你们才聪明啦，你们不怕短命！你们别以为我不晓得你们这些小东西捣的鬼！”

室外又是一阵哄笑。

这时又有一个小同学说：“易先生，我们平常实在抢不赢他，他吃得又多又快，我们都没有报告。今天他没有抢赢我们，就来报告了。”几个小同学都笑起来，室外的同学也哈哈大笑。

易老虎也忍不住要笑，但他终于没有笑出来。这种尴尬场面，易老虎感到不好收拾，但又想维持他的尊严。就突然拉下脸来，给了那个小学生一个耳光。那个小学生立时哭了起来。

沫若忍不住说了一句：“易先生，你真野蛮！”

“野蛮，野蛮！”室外的学生也叫了起来。

“野蛮校长，野蛮校长！”

“哪有文明时代还打学生的！”

“太不人道了，蔑视我们学生的人格！”

你一言我一语地都在批评易老虎。

易老虎的脸上红一块、白一块，有点下不了台。突然他怒气冲冲地走进了他的房间。一会儿他宣布要辞职，说学生不听管束，忤慢尊长。这把教职员和学生们都吓住了。教员、学生都推了代表去挽留。那天下午全校课都没有上成，一直闹到晚上，易校长才被挽留住。

郭沫若被记大过一次，其余6个小同学罚两个礼拜不准出校门。

沫若虽受了处分，但他敢于反抗易老虎的名声也出去了。他渐渐成为高等小学堂的一个小领袖。

1907年秋季，沫若由乐山小学升入嘉定中学。沫若满以为中学的教育要比小学高明，能够满足自己的求知欲，结果，还是令他大失所望。例如那位教地理的先生，连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也说不清，还把地理和中国的风水迷

信混为一谈。教英语的王先生，他说的英语谁也听不懂，还杂夹着湖北腔，在黑板上写的英文字，谁也不认得。教植物的蒋先生，用的是别人的讲义，把“天然景象”误抄成“天龙景象”，在课堂上大讲《易经》的“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教国文的罗先生，还是一位秀才，留学到过东洋。他在讲韩愈的《送董少南序》时，竟然不知道“望诸君”是乐毅，因而在解释“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犹复有昔日之屠狗者乎”这句话时，解释成：“你去把那些诸君的坟墓吊望一下罢，看那市面上还有没有从前那位卖狗肉的？”

只有一位黄经华先生，人品学问都很好，沫若很敬佩他。他教沫若班上的《春秋》，是根据廖季平先生三传一家的学说讲授的。那种今文经学的新颖见解，很符合沫若的胃口。由于在新学方面的知识得不到发展，于是沫若就将兴趣和努力进一步倾向旧学了。

这时期，社会上流行西洋小说，特别是林纾翻译的英国作家哈葛德的《迦茵小传》，司各特的《撒喀逊劫后英雄略》（即《艾凡赫》）风行一时。沫若都找来读了。书中主人公的不幸遭际，冒险的经历，曲折的爱情，神奇的侠客生活，浪漫的情调……深深地吸引了沫若，对他后来的文学倾向有着重要的影响。

这时他还读到了维新派和革命派主办的报纸和书籍，如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和他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章太炎主编的《国粹学报》。他虽然不赞同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政治主张，但他却十分欣赏梁启超那种活泼生动富于鼓动性的文笔。他崇拜邹容、徐锡麟、秋瑾，佩服章太炎，敬仰孙中山。他决心要做个改造中国社会的人。

四、葱茏的爱国情怀

1910年春，郭沫若考进了成都的分设中学。

他原以为到了省城成都这样的大地方，一定可以学到更多的新知识。那知过了不久，他发现教员们除了比嘉定要威风以外，品德、学问依然和嘉定一样。一样是一些不学无术骗官做的教职员，一样是一些不求上进骗文凭的学生。学界的腐败，社会的黑暗，朝廷的昏庸，有时曾使他心灰意冷，甚至想出家去当和尚。他自己曾写了一首诗流露了这种情绪：

我已久存厌世心，每思涤虑脱尘俗。

头上头发如沙弥，人是如来古金粟。

毕竟成都是四川省的政治文化中心，革命或维新的风潮也时时波及到这里。他向往革命，崇拜革命党人，深信只有他们才能拯救中国。

1910年12月，分设中学停课复习，准备期末考试。一场风暴这时从北京刮到了成都。这即是国会请愿运动。

这次请愿运动是由资产阶级立宪派发动，反对清政府欺骗国人，拖延召开国会，拒绝立宪。

这个请愿风潮，当年12月传到了成都。成都的高等学堂的学生，便向成都各学校印发了一份传单，号召各校推举代表，第二天上午10点在教育总会开会，商讨请愿早开国国会的事。

传单到了分设中学，各班立即推举代表，准备参加明天的请愿大会。两班不少同学提议：“请郭开贞做我们的代表！”大家举手表决，一致通过。

郭沫若当仁不让，第二天上午就代表全班去参加大会。

会上大家推举了著名的刘子通先生做主席，并兼请愿通告的起草委员。大会议决了三条。第一，要求明年召开国会；第二，要求四川总督赵尔巽代奏朝廷；第三，实行总罢课，不达目的誓不复课。

谁知，第二天刘子通就被赵尔巽秘密逮捕，这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一致决议：继续罢课，拒绝期末考试；要求释放刘子通先生；要求早开国会。

就在宣布继续罢课的第二天，四川提学使司按照赵尔巽的指示，向各校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禁止学生罢课要挟政府，如不听命，首先惩办各学校领导人。

此令一下，那些为了保住头上乌纱帽的校长们，从原来的袖手旁观，一变而为政府的帮凶了。分设中学校长宣布第二天开始期末考试，谁不参加考试就开除谁。

这一着还真灵，运动一下子冷了下来，复习功课的热潮在学校里突然升了温。代表们成了头不沾天、脚不着地的人物。郭沫若的处境非常尴尬。他想：“课，是罢还是不罢？自己既然当了代表，又举了手，表了决，总不能又带头退却？”

丙班首先考英语，一大早自习室里一片“but”、“cut”、“put”的英语复习声。不少人都把钢笔、墨水准备好了。

8点钟上课铃打响了。大家既然过去一致同意罢课，这时如果自己先走上课堂，有点对不住大家。因此，谁也不愿带这个头，都在自修室里观望。

监学走来劝大家上课堂，但谁都不动。他便连说带劝拉走两个学生。又回来拉第二拨。那知第一拨被拉走的学生又跑了回来。两个监学疲于奔命，结果还是没有办法，便去请监督（就是校长）。

监督来了，他勾着他那个长脖子，理着他那八字胡须，指着学生说：“你们为何不上课堂？”“你们快去上课堂！”大家仍旧不动。

他又指着小同学说：“你们这些小孩子，为何也要跟着大孩子闹？你们也要去参政吗？你们真蠢！你们受骗了！”他边说边拉小同学，拉去一个，又来拉第二个，前一个却又跑回来了。

他见拉人的办法不行，便将丙丁两班学生集合在自修室门外，一字排开，隔着天井，对面就是他们的课堂。监督还用劝说的调门对大家说：“我看，你们是害羞。你们怕先走，别人笑话。好，我有一个办法。你们听我的口令，我叫一、二、三，你们就一齐开步走，走到对面课堂去！”

说完，只听他高喊：“用意！”他把“注意”说成“用意”，大家都笑起来。监督以为他这种幽默成功了，便提高了他那四川的京腔，又高喊一声：“用意！”“大家不要笑，我要喊一、二、三了。用意！一，二，三！一齐开步——走！”有人想抬脚，一看别人没有动，就又将脚收回了。结果，大家还在原地。

监督一见这种办法又遭到失败，便恼羞成怒。他那张古铜色的面孔，胀成了一付猪肝色，八字胡须也在一掀一掀地痉挛。

突然，他的目光落到了郭沫若的身上。“郭生！”他喊道：“你叫他们上课堂！”

郭沫若回答：“连监督都叫不动，我哪有那样大的能耐！”

“那么，你就先进课堂做个榜样！”

这真有点咄咄逼人。沫若想了想说道：“先生，大家都是为爱国甘愿牺

牲自己的学业，我不能来做破坏运动的罪魁。”

这句话可把监督气坏了。他指着郭沫若和另一个同学张伯安骂道：“啊，你两个，真对不住我！你们在本地中学闯了祸，遭到斥退（即开除），是我把你们收进了学校。啊，啊，你们忘恩负义！我以为你们可以改过自新，哪知，你们又来和我作对。你们又在这儿闹事，把一些很好的同学都带坏了！我最后问你们一句：你们到底进不进课堂？不进课堂我就斥退你们！”

沫若回答道：“先生，我不能带这个头！”

张伯安也坚决地说：“士可杀而不可辱。先生，要斥退就请斥退吧！”

郭沫若、张伯安就这样被学校宣布开除。

说来也巧，正在这时，郭沫若的大哥郭开文回到四川成都来了。他去日本留学，学了几年法政，今年在北京考上了法科举人，并得到了一个七品京官的头衔，被派到北京法部衙门做事。他这次回成都，是应了成都官办法政学堂的聘请。

大哥回省的消息传开了，分设中学的监督也去了他下榻的地方拜访他。想请他担任分设中学甲班的法制经济课。为了能得到沫若大哥的答应，监督主动提出让沫若和张伯安复学。于是沫若在被开除后的第四天，又搬回了学校。

1911年，这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难忘的年头。这年的10月10日，爆发了武昌起义。而武昌起义正是从四川的保路运动开始。

这年5月，清政府下了一道谕旨，宣布将京汉、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实际上是把铁路所有权出卖给帝国主义。这引起四川的绅商们极大的气愤，学生们也很关心这件事。

5月下旬，川汉铁路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郭沫若和几个同学也去旁听了。会场上的热烈气氛，大家誓死保卫川汉铁路的决心，也使郭沫若流泪了。大会决定成立“保路同志会”，联络全省全国同胞，号召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税，反抗到底。在很短的时间内，人们的积愤被掀动了起来，形成了保路的高潮。

清政府见四川情况不妙，立即派了有名的杀人不眨眼的赵尔丰来镇压。他一到成都，立即逮捕了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全城震动了。市民们一齐拥向了总督衙门，要求释放保路同志会领袖。赵尔丰下令开枪，好多人都被打倒了，满街都是死伤的人。

全城立即罢市，罢工，学生罢课。成都保路同志会派人向各地传送赵尔丰杀人的消息，要求全省暴动。

分设中学的学生们还创造了一种新的通讯方法，名叫“水电报”。就是在—块木板上写上消息，叫各地火速起义，援救成都。然后将木板放到川河里，让它漂向下游各地。

荣县最先暴动了，同志会攻占了县城。接着新津也暴动了，杀了县官。各县都闻风响应。

四川一乱，全国骚动，清政府仓惶失措了。又派了湖北总督端方，率领了湖北两个旅新军，浩浩荡荡杀奔四川来了。

由于武汉清政府防备空虚，革命党人便在武昌发动了起义，一举成功。

当端方带领的鄂军走到重庆时，武昌起义便爆发了。他的后路被切断。他走到资川，后面的重庆，前面的成都，都宣布独立了。他终于死在他带领的新军之手。

在四川宣布独立的头一天，沫若就从他大哥和堂兄三哥那儿知道了这个消息。他欣喜万分，立即赶回学校，告诉了同学们。学校里立刻沸腾了。“万岁！”“革命成功万岁！”一片欢呼声。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留在人们头上的辫子剪掉。沫若首先剪掉了自己头上的辫子。这条辫子，不久前他还曾因为它长得不粗不长而懊恼过。在乐山上学时，也曾因为自己的辫子短，而买了一条假辫子装上。现在，他已毫不可惜了。

他们拿着剪刀去向那些拖着猪尾巴的人动手。特别是那些怕事的学生和首鼠两端的老教员，他们还不敢或不愿意马上就把它剪去。沫若就带领一帮人围捕他们，追得他们鸡飞狗跳，特别是那位监督，他死命抱着自己的头，连连地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

沫若对他说：“都先生，不要再为它可惜了，我们所受的耻辱已经够长的了，现在把它除去，祖宗的在天之灵也一定会高兴的。”不由都监督分说，几个学生按住他，“咔嚓”一剪刀，就把那条足有三尺长的尾巴剪了下来。

这年春节，沫若回沙湾过年，他给自己家也给别人家写了不少春联，内容大都是歌颂辛亥革命的。如：

共和三脱帽，

光复一戎衣。

桃花春水遍天涯，寄语武陵人，于今可改秦衣服。

铁马金戈回地轴，吟诗锦城客，此后休嗟蜀道难。

国势已变更，冉冉春回，问东君尤名皇否？

天心早眷顾，眈眈虎视，嗟西虜其奈我何！

故国同春色归来，直欲砚池溟渤笔昆仑，裁天样大旗横书汉字。

民权如海潮暴发，何难郡县欧非城美澳，把地球幅员竟入版图。

这些春联都反映了他当时对辛亥革命胜利的喜悦心情，流露了他那葱茏的爱国情怀。还有一些春联则反映了他心忧天下、壮志报国的决心。如：

力挽狂澜，旰食宵衣新主业。

忧先天下，江湖廊庙小臣心。

击筑且高歌，英雄意冷三杯酒。

弹琴复长啸，壮士胸罗百万兵。

可是，辛亥革命的胜利，只是昙花一现，革命的果实很快便落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代表袁世凯之手，中国仍在黑暗中。他实在忍不下去，他要游学欧美日本，去寻找真理，学好本领，振兴中华。

1913年秋，他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走出夔门，飞向广阔的天地。

五、为求新知渡东瀛

1914年1月，郭沫若在他大哥的支持下，东渡日本，开始了他10年的留学生涯。

到日本后，他在东京找到了一间乡下农民的房屋住了下来。他将大哥给他的一根金条换成了365元日本币，还了友人垫付的路费100元，置办生活用品、书籍杂物又用去了80多元，只剩下180元。大哥曾对他说，只有这一

点支持，如他能在半年中考取官费学校，这点钱还勉强够，如考不取，只有回国。沫若想，拼命也得考上官费，考不上，我就跳进太平洋。

从到日本的第一天起，他一面拼命用功，一面在生活上精打细算。他计算着每月只能用 30 元，其中房费 15.5 元，烧煤费 3 元，补习日语费用 5 元，往返神田日语学校的车费还要 1.5 元，如果再加上洗澡、理发费用，再吸点烟、喝点酒，那就连吃饭钱都没有了。不能这样，房费、煤费、日语补习费都不能省，只有在其他费用上节省。他决心步行去补习日语，万不得已不坐车，洗凉水澡，一月理一次发，在理发摊上理，不吸烟，不喝酒，不看戏，不逛公园，早饭两大片面包，一杯牛奶，中晚各是一小甑饭，一盘蔬菜，一小碟咸菜。第一个月下来，他用去了 27 元，心里有了一个底。

这种俭朴的生活，郭沫若自出生以来从未尝过。从前那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无荤不下饭的生活没有了。现在不仅不能吃十分饱，而且事事都得自己操持。开始，他真受不了，曾偷偷地流过不少泪。但是，当他一想到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一段话，他便咬牙坚持下去。他曾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说：

……不苦不勤，不能成业，男前在国中，毫未尝辛苦，致怠惰成性，几有不可救药之概。儿自今以后，当痛自刷新，力求实际学业成就，虽苦犹甘。

他说到做到，日又继夜地拼命苦读，补习日语，补习数学，补习自然科学常识，每天只睡四五小时的觉，两眼充血，几次眼球上毛细血管破裂，白眼球变成红眼球。同室的中国同学杨伯钦劝他注意休息，否则将难以坚持到底。可是，沫若一心想的是，无论如何也要在这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考上官费。他笑对杨君说：“不要紧，我身体顶得住。”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 5 个月的刻苦学习，7 月，他终于以名列第七的好成绩，考进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预备班，取得了官费入学资格。同乡的杨伯钦、吴鹿华都向他祝贺，称赞他了不起。说像他这样仅花了不到半年时间就考上官费，真是史无前例。

郭沫若本来喜欢文学，但那时“富国强兵”的口号，深深地打动了每个青年，都想学一些实际的学问，使国家富强起来，不受人欺侮。对于文学普遍有一种厌弃心理。沫若的大哥也不主张沫若学文科，而沫若自己又厌恶法政、经济。对理工科，他又认为自己的自然科学基础差，尤其对于数学更有一种畏难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选择医科。他大哥这时也竭力主张他学医。他写信告诉他父母说：“医学一道，近日颇为重要。将来学成归国，做一个跑道医生，背着药囊，走遍全国的乡村，专门替贫苦的人们作义务的治疗。”实际上，他内心仍然倾向文学。

沫若在进入高等学校后，拦在他面前的又是一道德文关。因为，那时日本的医学完全是德国流派，教科书也是德文版，不通德文不行。前一段，沫若用了半年时间通过了日文，现在又面对德文这个拦路虎。他是一个极端好强的人，永远不甘落后。于是，从 1914 年下半年起，他又开始了第二次冲刺。他哪儿也不去玩，除了宿舍、饭堂，便是教室、图书馆，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第一学期下来，德文成绩不算太好，但总成绩却排名全班第五。第二学期预科毕业考试时，他不仅德文过了关，而且总成绩跃居全班第三名。

1915 年 1 月，日本帝国主义以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为条件，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条款，逼迫中国政府接受，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5 月 7 日，日本政府竟然下了最后通牒，限在 24 小时内答复。郭沫若闻讯后热

血沸腾，决定与友人连夜回国要求政府不要妥协，甚至作好了参军的准备，如果中日开战，他将立即投笔从戎。他愤然写下了一首七律：

哀的美顿书已西，冲冠有怒与天齐。
问谁牧马侵长塞，我欲屠蚊上大堤。
此日九天成醉梦，当头一棒破痴迷。
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

但当他抵达上海时，获知袁世凯已经屈从了日本的无理要求。他独步在上海街头，一时不知何去何从。他记起了曾子的一句话：“士不可不宏毅，任重而道远。”决定还是重返日本求学，武装自己，以图将来。

由于用功过度，他渐渐感到精神不济，睡眠不好，吃饭愈来愈少，身体急剧消瘦下去。他常常精神恍惚，夜间不断做恶梦，记忆力衰退，常常读了后页忘了前页。他还出现了心悸，即使缓步慢行，也感到胸部震痛。他从医学常识中知道，这是一种极度的神经衰弱症。他由恐惧感到悲观。心想，好不容易争取到了官费，又好不容易通过了预科考试，却得了这种病。后面的高中三年、大学五年又怎能坚持下去呢？即使勉强学下去，不是留级便是开除，到那时又有何面目去见大哥，去见父母？去见祖国？与其将来受辱，还不如干脆去死。自杀的念头，一次次涌上他的心头，但又总感到这样去死实在太冤，还是等到最后留级或被开除时再去自杀。他这种消极悲观情绪，和那种不甘轻生的念头，时时在他的头脑中打架。他愈是这样焦躁，神经衰弱症愈是不能好转。他气恼、悲观，时时在无人处痛哭。

这年9月的一天，他无意间走进了东京一家旧书店，忽然他看到书架上有一部《王文成公全集》。他知道这是中国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的一部书。他随手抽出了一册，一翻开，赫然一首《泛海》诗跳进了他的眼帘：

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
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

他首先被前两句触动了。于是，他便迫不及待地看了下去。原来这是王阳明36岁时写的一首诗。那一年，他因触犯了朝中阉宦刘瑾八虎的虎威，被谪贬为龙场驿驿丞。就任途中，刘瑾命人追杀他。王阳明逃到海上，又遇上了大风浪，桅摧橹折，船差一点被打沉，后来竟被风浪吹到了福建海岸，王阳明才得以脱险。上面这首诗就是写他在海上遇到大风浪时的心境。

郭沫若想象着王阳明那时的情景：头上是明静的月夜，周围是险恶的波涛，一叶孤舟在汹涌的波涛上和死神搏斗，而舟上的王阳明心性却异常平静，他视凶险犹如浮云之于太空。这是何等沉毅的大勇！他由此联想到孔子在陈绝粮，却倚树而歌的情景；耶稣在海船上遇飓风，而喝令风浪停歇的神情。他想这都是仁者、智者在艰难险阻中，净化自己，扩大自己，征服自己，体现了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气魄。想到这里，他顿感自己非常渺小，遇到身上这样一些小病，就消极悲观，痛不欲生，这比起他们来，真是惭愧无地自容。在书中他看到王阳明30岁时患了肺结核病，他也曾萌生厌世的念头，后来他在四明山的阳明洞中静坐，打破了名利关，与病魔搏斗，与死神搏斗。他做到了内外不悖，出入自由，安身立命，实现了他的人生意义。沫若从王阳明身上体会到，要达到那种境界，入手的工夫就是“静坐以明知”，“磨炼以求仁”，努力于自我的完成与发展。于是，他便学起了静坐，去除杂念，潜心默坐，每次30分钟。

沫若坚持这种静坐方法，半月以后，他的睡眠逐渐加长了，梦也减少了，

心跳过速也渐渐平和下来。

就在这时，他又认识了安娜，爱的雨露，更使他这株萎顿的禾苗获得了复苏的生命。1916年冬天，安娜来到了冈山，他们同居了。

六、“五四”风暴中的雄鹰

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暴来了。风暴也吹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郭沫若也受到了震荡。

过去，他对北洋军阀政府还认识不清，现在，他终于看清了它的面目了。原来它是一个卖国政府，与帝国主义一鼻孔出气。中国要独立、要富强，首先不是什么振兴实业，而是首先要推倒这个腐败的卖国政府，赶走侵略中国的列强，脱胎换骨地独立自主地重新创造。

他在想：“学医有什么用！我把有钱人的病医好了，只会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榨取穷人；我把穷人的病医好了，也只会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受富人的剥削。学医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像这样我宁肯饿死！”他决定放弃医学，转向文学，用文学去拯世道、救人心。

印度诗人泰戈尔的《新月集》，是使郭沫若走向新诗的第一步。1916年泰戈尔访日，日本的泰戈尔热达到白热化。沫若又继续读了他的《吉檀迦利》、《园丁集》、《暗室王》和《加皮尔百吟》等诗集，深深被他那种清新的诗情所吸引，好像探得了生命的清泉一样。每天一下课，他便跑到幽暗的阅览室里，捧书面壁默诵，感受着诗美的欢悦，涅槃的快乐。

但是，当他读了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后，又立即与这位美国诗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惠特曼那种雄浑、豪放、不拘一格的诗风，震撼着郭沫若的灵魂，这更合于郭沫若的性格。他个人的郁积，中华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到了一个喷火口，也找到了一种喷火的方式。他心中的烈焰和溶岩，立时化为斑斓、灼热的诗的篇章。他歌颂旧世界的叛逆者，歌颂革命领袖：

倡导社会改造的狂生，瘦而不死的罗素呀！

倡导优生学的怪论，妖言惑众的哥尔栋呀！

亘古的大盗，实行波尔显威克的列宁呀！

西北南东去来今，

一切社会革命的匪徒们呀！

万岁！万岁！万岁！

这就是他的《匪徒颂》。他诅咒旧世界，诅咒一切邪恶势力：

啊啊！

生在这样个阴秽世界当中，

便是把金钢石的宝刀也会生锈！

宇宙呀，宇宙，

我要努力地把你诅咒：

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

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

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

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

你到底为什么存在？

《凤凰涅槃》

他歌颂地球，歌颂这位伟大的母亲：

地球，我的母亲！
今后我要报答你的深恩，
我知你爱我还要劳我，
我要学着你劳动，永久不停！

地球，我的母亲！
今后我要报答你的深恩，
我要把自己的血液来
养我自己，养我兄弟姐妹们。

《地球，我的母亲》

他眷恋祖国，他要为祖国燃烧自己，发出自己的光和热：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不辜负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啊，我年青的女郎！
你该知道了我的前身？
你该不嫌我黑奴卤莽？

唯我这黑奴的胸中，
才有火一样的心肠。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想我的前身
原本是有用的栋梁，
我活埋在地底多年，
到今朝总得重见天光。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自从重见天光，
我常常思念我的故乡，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炉中煤》

他用文学的生命力去唤醒国人，以新诗的感召力为这个时代呐喊。他把这些诗搜集成册，以《女神》为名出版。在该书的《序诗》中他说：

《女神》哟！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
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姐妹胸中，
把他们的心弦拨动，
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

《女神》的问世，震动了当时的文坛，拨动了“五四”时代一代青年的心弦，开创了中国的新诗时代。郭沫若也因此成名。

1920年4月，郭沫若决心休学和成仿吾一起回上海创办纯文学杂志。经过3天海上航行，船进了黄浦江口，沫若那欢快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啊，

祖国，你的儿子回来了！”

他看着那晴朗的清晨，看着那淡黄色的黄浦江水，看着那海鸥一样的白帆船，看着那两岸漾着青翠的柳波，他的诗潮澎湃了。几年来他所渴望的故乡，所苦想的“爱人”，终于见到了。他头脑中形成了这样一首诗：

和平之乡哟！
我的父母之邦！
岸草那么青翠！
流水这般嫩黄！
我倚着船栏远望，
平坦的大地就像海洋，
除了一些青翠的柳波，
全没有山崖阻障。
小舟在波上簸扬，
人们如在梦中一样。
和平之乡哟！
我的父母之邦！

可是，当他愈朝前进，他眼中那幅美丽的风景画，渐渐改变了模样。嫩黄的水变得浑浊肮脏，煤烟、纸屑到处飞扬，香烟广告，接客先生，乞丐样的码头苦力，黄包车夫，还有那耀武扬威的高鼻子洋人……成了一个大的垃圾箱。在街上，满眼的长袖男、短袖女，一个个都呈现着营养不良的烟火色。那些汽车、电车、黄包车，怎么看也好像似一些棺材。沫若的眼泪又不禁地流了出来。他写道：

我从梦中惊醒了！
幻灭的悲哀哟！
游闲的尸
淫器的肉，
长的男袍，
短的女袖，
满目都是骷髅，
满街都是灵柩，
乱闯，
乱走。
我的眼儿泪流，
我的心儿作呕。
我从梦中惊醒了。
幻灭的悲哀哟！

他带着一种失望的心情，进入了上海。

1921年6月，郭沫若与成仿吾、郁达夫、田汉、郑伯奇、张资平等人发起、组织了“创造社”，出版了《创造季刊》。这是中国文艺园圃中的一朵鲜花，是中国浪漫主义文艺的一面旗帜。

1923年，郭沫若出版了他第二本和第三本诗集《星空》和《前茅》。由于中国革命的深入，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他也逐渐摆脱消极影响，克服那种低回的情绪和虚无的幻影，看到了光明。

1924年，他用了两个月的时间，翻译了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

织与社会革命》一书，这对他的思想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说：“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傍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出了的是它。”他感到，过去那种追求个性解放，追求个人自由，未免太狭隘了。他说：“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人要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未免出于僭妄。”他认识到现在是两个阶级血淋淋斗争着的时代，只有推翻反动统治，推翻黑暗社会，才有大多数人的自由，大多数人的个性；也才有自己的个性与自由。于是，他在文学上便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他主张文艺应是“被压迫者的呼号”，“是生命穷促的喊叫”，“是斗士的咒文”，“是革命预期的欢喜”。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郭沫若在上海南京路上，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的凶横残暴，激起了他无比愤怒。他曾为“四川旅沪学界同志会”起草了一个《五卅案宣言》，揭露了帝国主义者的面目，提出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要求。认为中国人若不想沦为亡国奴，非反对帝国主义不可。

七、戎马书生与历史学者

1926年，由于瞿秋白的推荐，郭沫若被聘为广东大学文科学长（即系主任）。3月，他和郁达夫等人来到广州。这时的广州已是国民革命的根据地。在这里，他先后结识了共产党人周恩来、毛泽东、林伯渠等人，使郭沫若的思想实现了最大的转变。

7月，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郭沫若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战争。他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兼行营秘书长。革命征途上，他在汨罗江畔露营，崇阳山中跋涉，咸宁道上奔波，武昌城下战斗，总是走在大家前面。攻下武昌后，他日以继夜地开展政治宣传工作，扩大革命影响，查封反动报馆，控制舆论导向。不久，他被委任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并晋升为中将。11月初，他奉命前往江西主持政治宣传工作。

当时蒋介石出兵在江西。他一路收编军阀部队，积极扶植和扩大反动势力，限制和破坏工农运动，排斥和打击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进入江西后，他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大资产阶级加紧勾结，到处穿插亲信，搜罗流氓势力。他曾拉拢郭沫若，秘密委任他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要郭沫若跟他走，并说：“我把浙江拿下以后，长江六省的政权就请你负责。”郭沫若不为所动。他将蒋介石对他的秘密委任和谈话情况密电当时已迁至武汉的国民党中央。中央指示郭沫若“虚与委蛇”，密切注意蒋的动向。

1927年3月6日，蒋介石指示他的亲信倪弼，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梦贤。郭沫若要求严办倪弼，蒋介石却包庇着他。接着蒋介石又指使段锡朋捣毁了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南昌市党部、九江市党部和安庆市党部，以及总工会等一些革命机关团体。开始，郭沫若还未看出蒋介石的阴谋，以为只是他下边的人干的。但到3月22、23日，蒋介石指使他手下杨虎等暴徒捣毁安徽省党部和各种合法的民众团体，并捏造事实，污蔑共产党时，他已完全看出并得知了蒋介石的阴谋，便三次派人向安徽省党部和各革命团体通报消息，使很多重要人物幸免于难。事后，他又游说李宗仁，希望他在安庆举事，反蒋和肃清反革命势力。他的游说未成，只好用金蝉脱壳计离开了安庆，潜回南昌。

第二天，他在南昌朱德家里，奋笔疾书，用了将近一天时间写成了讨蒋

长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第三天，他又写了一篇《请告革命战线上的武装同志》，号召武装反蒋。这是他最早揭露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阴谋，最早举起了反蒋旗帜。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又随同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东征讨蒋。当他抵达九江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了。他拒绝了张发奎的拉拢，赶赴南昌，参加了起义。

8月5日，他随南昌起义部队南征广东。就在这革命遭到失败之际，郭沫若的意志却更加坚定，他要求参加共产党，愿为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贡献一生。9月初，在江西南部瑞金河边的一所小学里，他和贺龙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一起参加了共产党。从此他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他担任了南征部队的政治部领导工作。沿途向群众宣传反蒋，宣传革命。汤坑一战失利，许多壮士牺牲。革命军不得不放弃汕头，转战闽南、粤北。总政治部在流沙战斗中被打散，他在当地革命群众的掩护下，秘密乘船去了香港，11月初，回到上海，才与共产党中央取得联系。

这时，他想加强创造社，重新拿起笔来战斗，并邀请鲁迅合作。鲁迅也早就有“与创造社联合起来，是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的想法。他们的愿望不谋而合。然而，终因创造社内部少壮派们的梗阻，使郭、鲁的合作成了虚话，随后还引起了一场误会。

而这时，郭沫若正受着蒋介石三万元的悬赏通缉，国内难以存身。党安排他去莫斯科。他已做好一切准备，却因一场斑疹伤寒住进了医院，误了去苏联的船期。病中他表示：

我已准备下一杯鲜红的寿酒，
朋友，这是我的热血充满心头。
要酿出一片腥风血雨在这夜间，
战取那新生的太阳，新生的宇宙！一个共产党人的坚毅战斗精神跃然纸上。

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全家东渡日本，开始了他10年的流亡生活。

到日本后，郭沫若化名吴诚，潜居在日本东京千叶县市川。这年8月，东京警视厅终于查清郭沫若的身份，并逮捕了他。他被囚禁在警察局的牢房里，感到好像整个祖国都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污辱，他不断地提醒自己：“我是中国人！”

3天以后，他虽获保释，但从此郭沫若的行动便长期受着日本警察和宪兵的双重监视。他暗暗地激励自己：

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中，你得拿出勇气和耐心来，更坚毅地生活下去。你虽然离开了祖国，离开了工作岗位，你不应该专门为全躯保妻子之计，便隐没下去的。

他仍要工作，仍要战斗。他想到，在身处异国的环境里，已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投笔从戎，只有在思想文化战线上重新拿起自己的笔来战斗。他看到，中国虽然经过了“五四”运动，经过了国民革命，但是旧的保守思想、反动思想，仍象一道道绳索束缚着人们。一些人用“国情不同”来排斥马克思主义，而一些教条主义者、假马克思主义者又脱离或歪曲中国的国情，损害着马克思主义的名声。这些都阻碍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阻碍着中国革命。他认为，在思想文化上的当务之急，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让中国

人民感觉到：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外来异物，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已经有它的根蒂，中国的历史发展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规律的。于是，他就用他的全部精力以马克思主义做工具，研究中国历史，用历史来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异己的东西，而恰恰是我们所需要的。

这期间，他集中精力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哲学的贫困》，列宁的《党对于宗教的态度》，还边读边翻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马恩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开始了他对中国古代社会和古代文化的研究。

从1928年7月起，他在埋头钻研的基础上，写出了一系列文章，于1930年3月，集成了那部开创史学新纪元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国古史的浑沌，终于被他用马克思主义这把金刚钻凿开了，证明中国也经过了奴隶社会。

他为了把古代史研究置于更加坚实的基础上，又用了更大的精力钻研中国的古文字学。为了打开甲骨文、金文的宝库，他埋首于“东洋文库”，“读完了库中所藏的一切甲骨文和金文的著作”，“也读完了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对甲骨文进行了全面研究。不久，他即写出了《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和《殷契粹编》，使这门学问别开生面，在研究方法和文字考释上，都取得了巨大的突破。

在殷周青铜器铭文的研究上，他为殷周青铜器的分期断代，建立了一个科学而明晰的系统，两周八百年的青铜器浑沌，也被他凿开了。他又写出了《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古代铭刻汇考》、《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图录考释》等著作。在甲骨文、金文、青铜器之外，郭沫若又在石鼓文研究上做出了特出的贡献。商龟周鼎，白骨顽石，到了郭沫若的手里，才算由“骨董”变成了最有价值的史料。他判定中国在殷商两周时期经过了奴隶社会，正是建立在这种考古研究的基础上的。他一跃而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

10年间，郭沫若在日本研究中国历史，并没有忘情于祖国的社会现实，他积极参加了促进国内进步文艺界的团结工作。他是“左联”的发起人之一。他积极支持“左联”东京分盟主办的《东流》、《杂文》、《诗歌》三个刊物，经常为这些刊物撰文。他写出了几篇历史小说，讽谕现实，抗日反蒋；写出了5本自传体小说，有意识地想通过他个人经历反映当时的社会，从而揭露它、批判它。这一时期，他还翻译了许多西方哲学、文学、美学、考古学著作。他成了世界公认的伟大学者，中国文坛的又一面旗帜。

八、人民喉舌与民主斗士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占我东北，入侵华北，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郭沫若忧心如焚，对祖国的思念更加强烈。他反复吟咏鲁迅那首诗：

椒焚桂折佳人老，独托幽岩展素心。

岂惜芳心遗远者？故乡如醉有荆榛。

他每吟一次都要流泪。他曾写下这样一首诗：

信美非吾土，奋飞病未能。

关山随梦渺，儿女逐年增。
五内皆冰炭，四方有谷陵。
何当挈鸡犬，共得一升腾。

1937年5月下旬，他接到郁达夫来信，称：“今晨因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指蒋介石）有所借重，乞速归。”郭沫若心花怒放，归国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他在友人金祖同和钱瘦铁的帮助下，买好了船票。

临走的那天清晨，郭沫若一夜没有合眼，4点半，他在几张白纸上给妻子安娜和几个儿女写下了简短的留言。他决心趁他们还在熟睡中悄悄离开。他踱进寝室，看到安娜已经醒了，正在倚枕看书，儿女们都纵横地睡得很安稳，沫若禁不住流下泪来。他连忙擦干了眼泪，掀开蚊帐，在安娜的额头上亲了一下，以作告别。安娜不知沫若的用意，微笑了一下，眼睛也未离开书。她听到沫若的木屐声走下了台阶，还以为他同往常一样去散步哩。

沫若走上大路，他一步一回头地望着妻儿们所在的家。眼泪禁不住泉涌而出。他默诵着今夜枕上吟成的那首诗：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7月27日，郭沫若回到了上海，立即投入了抗日运动。在淞沪抗战中，他奔波在前线与后方。领导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救亡日报》，组织战地服务团。上海沦陷后，他转移到香港和广州，恢复《救亡日报》。在此期间，他写出了很多鼓动抗日救亡的文章和诗词，后来编为《羽书集》和《战声集》。他还写出了《甘愿做炮灰》和《棠棣之花》两个话剧，这些作品，把人民抗战的火焰点得更加旺盛。

1938年1月，郭沫若到武汉，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他担任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以第三厅为根据地，团结了广大进步的文化工作者，组成了一个抗日宣传中心，以各种形式号召人民起来抗日。

1938年10月，武汉陷落，郭沫若率三厅人员转移重庆。蒋介石这时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压制人民群众的抗日活动。三厅的抗日宣传活动不断遭到国民党的阻挠，被迫陷于停顿。蒋介石强迫三厅工作人员加入国民党。郭沫若巧妙地予以拒绝。他说：

加入国民党本来不成问题，我自己以前也做过国民党的党员。不过，为三民主义而奋斗，重在行动上实际上执行三民主义，形式上的加入不加入，并不是重要的问题。这好比，相信佛教的不一定做和尚，做和尚的不一定都是相信佛教的。

蒋介石见此计不成，便下令免去郭沫若三厅厅长职务，调任政治部部务委员。这是一种明升暗降的办法。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三厅全体进步文化人，来了个集体总辞职，给了蒋介石当头一棒。蒋介石怕文化人跑向延安，便又组织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仍请郭沫若主持。他规定文化工作委员会只对文化工作进行研究，不能从事对外政治活动。周恩来对郭沫若说：“蒋介石划圈圈，圈不了我们，我们可以跳出来干嘛！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同他们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展开我们的工作。”

于是，郭沫若便利用文工会这一合法组织，领导国统区的文化人，积极开展了有利于抗战、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工作，对国民党顽固派开展了一场反专制、争民主的斗争。

“皖南事变”不久，郭沫若即着手整理和修改了他的历史剧《棠棣之花》，突出了“主张联合、反对分裂”的主题，借历史题材鞭鞑了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1942年1月至1943年3月，郭沫若以亢奋情绪，连续写出了《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和《南冠草》五部历史剧。把历史和现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收到讽喻现实、批判蒋介石的巨大政治效果，也为中国现代话剧史树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这些历史剧如一股强大的爱国主义湍流，从历史长河中直向现代奔腾而下，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爱国与卖国，都在这历史的浪涛中接受着时代的检验，引起了人们心灵的强烈共鸣。屈原的精神，如姬的品格，夏完淳的形象，高渐离的坚贞，聂政、聂荃的气节，段功和阿盖公主的人品，都在他的历史剧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

这一时期，还形成了他第二个历史研究高潮。他写出了《屈原研究》、《甲申三百年祭》、《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历史著作，把中国的历史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在他的带动下，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这遭到了蒋介石统治集团的嫉恨，加紧了对进步文化人士的迫害。

他在进行文化斗争的同时，又积极投身于反蒋的民主运动，向蒋介石统治集团要求民主，取消专制，给人民自由权利。蒋介石暴跳如雷，解散了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在文工会解散的聚餐纪念晚会上说：“今天我们是被解散了，我们恢复了本来的面目，我们是更自由了。”中外进步人士闻讯后纷纷登门或驰函电慰问。远在昆明的李公朴、闻一多、费孝通、吴晗、光未然、沈从文等驰函郭沫若说：

“雾重庆”时代已经过去，光明与黑暗的阵营渐渐分明了。请您和您的朋友们坚持着我们文化界严肃工作的堡垒，紧拥着我们文化界庄严的大业，来争取我们国家民族的生命线——民主政权。请相信我们是你们的声援，如同你们广大的民众是你们的后盾一样，你们是不孤立的。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开始。毛泽东亲至重庆，争取实现国内和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郭沫若更加不避艰险，为实现国内和平、争取民主而奔走。他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与各民主党派人士配合，逼使国民党签署了政协决议。一时，民主的春风吹遍大地，人民欢欣鼓舞。1946年2月10日，山城重庆人民为庆祝政协成功召开大会。郭沫若、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等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蒋介石派遣暴徒，大打出手。郭沫若、李公朴等多人被打伤。蒋介石的反民主反革命面目更加暴露。

1946年，郭沫若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继续奔走呼号，他愤怒谴责国民党特务殴打民主人士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和杀害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他写文章号召人们：“化悲愤为力量，把恐怖还给施行恐怖政策者……扑灭法西斯瘟疫！”

黎明前的黑暗更加浓重，为了郭沫若的安全，中国共产党安排他去了香港。在香港他联络在港民主人士，声援上海学生的抗暴斗争，拥护召开新政协。还为《华商报》撰写文章揭露蒋介石抗战中的丑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郭沫若结合现实、结合历史写下了大量作品，

除上面说到的以外，还有《跨着东海》、《我是中国人》、《涂家埠》、《南昌之一夜》、《流沙》、《神泉》、《洪波曲》、《蒲剑集》、《蝸蟾集》、《历史人物》、《天地玄黄》和《迎接新中国》等文集、诗集。这些作品既是历史的真实记载，也是中国文化的珍品。

九、一切为了新中国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郭沫若也觉得新生了。他以无比旺盛的精力，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工程中去。由于他的成就与声望，他先后被推举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等职务，工作繁重，日理万机，但他精力充沛，意气风发。

在60年代中期以前，他将主要精力用于国务活动、文化交流和世界和平运动。

为了建立人民外交和促进文化交流，他不辞辛苦，多次率领代表团，跋涉亚、非、欧、美，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发展文化交流。他多次出席世界和平运动的重要会议，赢得了友谊，赢得了世界人民对我国的赞扬。为此，他曾荣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

他在领导科学文化教育工作中，又做出了突出成绩。他广泛团结科学家，重建和调整了科研机构，开辟了各科科研活动，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他建立了文物考古研究机构，促进了我国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的重大进展。他积极提倡文字改革，进行汉字的整理和简化，推广汉字横排，推动了出版事业的改革。他在领导学术研究和文化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主张各抒己见，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从不以势压人。他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积极倡导者。

在繁忙的国务活动和社会活动中，郭沫若也从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一直忙里偷闲，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从事写作。

1950年至1952年初，他写成了《奴隶制时代》一书。1953年至1954年，他用业余时间校释了《管子》。1956年至1963年，他组织了《中国史稿》一书的编写工作。这期间，他又创作了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和电影剧本《郑成功》。他还写了很多诗，收集成册的就有《新华颂》、《百花齐放》、《长春集》、《东风集》等。推动了中国史学和文学的发展。

1963年底和1964年6月，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问题作了两次批示，批评文联和所属各协会“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作为文联主席的郭沫若，有如千钧压顶。接着，历史学界一批郭沫若的知交又遭到了无情的批判。这使郭沫若疑虑交加。他停止了一切写作活动，预感到一场风暴即将降临。他要求辞去科学院院长和科技大学校长职务，未获允准。1966年4月，他又在会上表示，几十年来他写的东西，“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这反映了他无所适从和矛盾痛苦的心态。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连串的冲锋号吹响了，郭沫若心里充满了矛盾，也充满了疑问。他生平最厌恶虚伪造作，但他这时却承认，“自

己有时也不幸沾染了这种恶习”。他说：“如果大家都回复纯真的童心，那多好啊。不要有那么多的假面具，这么多装腔作势的表演。”

1967年5月，《人民日报》删去了早年毛泽东在信中赞扬过郭沫若的话，使郭沫若感到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一股凶猛的恶浪正向他卷来。1968年4月，他最喜欢的儿子郭世英被“文革”风暴迫害致死。噩耗传来，他呆若木鸡。他竭力克制悲痛，以反复抄写他儿子留下的日记来寄托心中的思念。他诵读李白和杜甫的诗，最后写成不打算发表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后来被迫发表时，他只好做了大量修改。书中他赞扬李白，而贬抑杜甫，这遭到文坛的不少非议。不过，此书中他对李白有这样一段评论：

诗友，酒友，道友，有的隐退，有的贬谪，有的受害，李白自己也有意离开，只是时间有早迟罢了。

然而李白的心境始终存在着矛盾。他一方面明明知道朝廷不能用他；但另一方面却也始终眷念着朝廷。这恐怕反映了郭沫若当时的心态。

1973年以后，“四人帮”逼他“批儒评法”，写“批宰相”的文章，他洞察“四人帮”的目的是要打倒周恩来，便拒绝写作。于是，江青在大会上指名攻击了他，并秘密组织大批判班子，妄图发动对郭沫若的公开批判。会后江青、张春桥又打上门去，逼他写检查，写批宰相的文章。郭沫若经受不住这样的摧残，从此一病不起。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传来，病床上的郭沫若笑了。他说：“我们又一次得到解放！”他神奇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粉碎“四人帮”的庆祝大会，傲然挺立了两个小时。在不长的时间里他就集成了《东风第一枝》一本诗集。这是他欢呼青春的恢复，欢呼文艺界、科学界春天到来的颂歌。然而，他自己却健康难复，1978年6月12日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86岁。邓小平在代表中央致的悼词中称赞他：“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